



Zhongguo Nongcun
ZHENGZHI TIZHI GAIGE

中国农村 政治体制改革

——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研究

□ 赖海榕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农村
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农村 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半竞争性选举研究

王绍光 著

三联书店



中国农村 政治体制改革

——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研究

□ 赖海榕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研究/赖海榕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0211-932-1

I. 中…

II. 赖…

III. 乡镇-选举-研究-中国

IV. 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616 号

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研究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实证研究篇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已有的研究	2
第二节 可供选择的几种解释理论	7
第三节 对村半竞争性选举的解释中存在的问题	13
第四节 本项实证研究的议程	17
第二章 概念、案例、数据和方法	18
第一节 概念	18
第二节 方法	23
第三节 数据和案例选择	30
第三章 什么是乡镇半竞争性选举	38
第一节 乡镇政府的决策权力	38
第二节 乡镇长（党委书记，或副乡镇长）的决策权力	50
第三节 乡镇长是如何任命的	51
第四节 什么是乡镇长的半竞争性选举	54

第五节	首批半竞争性选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及目前的分布	71
第六节	谁引入了改革	73
第四章	为什么乡镇一级会出现半竞争性选举	78
第一节	检验现代化理论	78
第二节	访谈对象所报告的原因	84
第三节	为何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落后促成了选举改革	90
第四节	约束地方干部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构	96
第五节	乡镇半竞争性选举引入所面临的不断变化的体制背景	105
第五章	实施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的影响	110
第一节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10
第二节	对地方各级权力分配的影响	112
第三节	对干群关系的影响	123
第四节	对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	125
第五节	对党政干部的影响	126
第六节	全国性的影响	130
第六章	实证研究小结	132
第一节	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的内涵, 发生发展的原因, 产生的影响	132
第二节	未来的发展趋势	137
第三节	半竞争性选举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138

第二部分 规范与政策研究篇

第七章	推动乡镇和县半竞争性选举的意义	141
第一节	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完善和地方经济发展	141
第二节	促进地方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152

第八章 推动基层半竞争性选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161
第一节 增强党的领导的信心	161
第二节 提高上下级政府间关系的法制化程度	170
第三节 提供地方多种制度选择	175
第四节 改革基层司法隶属关系	181
第五节 调整地方媒体管理体制	184
第九章 推动乡镇和县半竞争性选举的路径	187
第一节 以开放的思维落实已建立的制度	187
第二节 从县乡人民代表到行政首长	196
第三节 从乡镇到县	200
第四节 从农村到城市	202

第一章 导言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带有竞争性质的选举在中国农村地区逐渐涌现出来。^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类似的选举在乡镇一级也相应出现。^②本世纪初,在县一级也出现了类似的选举案例。所谓半竞争性选举,是指包括多名经过公开程序产生的候选人的选举,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之所以将这种选举称为半竞争性选举,是因为尽管选举过程中存在竞争因素,但并不存在对立的政党,而且竞选活动的开展方式和内容还有比较多的限制。

尽管如此,这些选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学术上,有人把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选举定义为确认性的选举或全民公决式的选举^③,在这样的选举活动里,选民只是对党和政府指定的候选人进行表态^④,而在半竞争性的选举中,选民有某种自主选择的余地,尽管选择余地还很有限。

① 凯文·欧博文,李连江:“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 — 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00年6月, No. 162, pp. 465 — 489。

② 李连江:《中国农村引入乡镇选举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roducing Township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中国季刊》,2000年9月, No. 171, pp. 704 — 723。

③ Everett M. Jacobs: “Soviet Local Elections: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Not”,《苏联研究》(Soviet Union Studies), 1970年7月, Vol. 22, pp. 61 — 76。

④ Jerome M. Gilson: “Soviet Elections as a Measure of Dissent: The Missing One Present”,《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1968年, Vol. 62, pp. 814 — 826。

第一节 已有的研究

半竞争性选举在中国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都致力于理解和探讨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的影响。^① 由于乡镇一级的半竞争性选举出现的时间较晚，县一级的半竞争性选举更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也由于县乡两级半竞争性选举的数据比较难以取得，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针对村一级的半竞争性选举。

人们首先很想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选举。在探索各种可能的原因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发展。凯文·欧博文认为半竞争性选举很有可能首先在相对富裕的村出现。^② 胡荣在对福建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③ 他们认为富裕地区的人们更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更能够就政治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

然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反对这种认为经济发展和半竞争性选举之间有正相关关系的观点。戴慕珍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半竞争选举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她推论“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推动民主改革”。^④ 相反，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半竞争性选举之间是

① 了解对中国农村选举研究的评论，见根特·舒伯特“Village Elections in the PRC: A Trojan Horse of Democracy?” 东亚研究所/东亚政治研究所，杜伊斯堡大学。也可见郭正林《国外学者视野中的村民选举与中国民主发展：研究综述》，2003年，《中国农村观察》，No. 5。

② 凯文·欧博文：《在中国农村实行政治改革》，《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1994年7月，No. 32，pp. 33-59。

③ 胡荣：《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委员会选举》，China21 (japan)，2006年，No. 8。

④ 戴慕珍：《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民主的村庄自治》，发表在 Maurice Brosseau, Suzanne Pepper and Tsang Shuki 等主编的《中国评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pp. 126-144。

一种负相关关系关系。^①

史天健^②、戴慕珍和罗思高^③、崔大伟^④、爱泼斯坦^⑤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和中国农村半竞争性选举之间应该是一种曲线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时，经济发展会促进半竞争性选举的产生和发展。但是，经济不断发展到经过了某个高点之后，对半竞争性选举发展的影响逐渐衰退。

大部分反对“繁荣论”的学者提出了实行半竞争性选举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即由村支书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史天健、戴慕珍、罗思高、崔大伟、爱泼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在中等发展水平的农村，村支书一方面缺乏资金资源来赢取村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说服”自己的上级通过操作选举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他们无力阻挡半竞争性选举的开展。

在富裕的农村，实行真正的半竞争性选举动力则更少。村领导可以运用资金资源来“买通”自己的上级，从而可以操控选举。同时，由于这些农村经济上的成功，村干部、乡镇政府以及党委都想维持一贯的非竞争性选举。而村民们也习惯了这种非竞争性选举的结果，只要选出来的村领导们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且将地方每年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以福利的方式分配给村民们，大家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改变现状。^⑥

① 戴慕珍：《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民主的村庄自治》，发表在 Maurice Brosseau, Suzanne Pepper and Tsang Shuki 等主编的《中国评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pp. 141。

② 史天健：《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Vol. 8, No. 22, pp. 425-442。

③ 戴慕珍，罗思高：《选举和权力：中国农村的决策制定机制》，1999年，Vol. 8, No. 22, pp. 513-539。

④ 崔大伟：《解放中国的农民：改革时代的农村重建》，（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p. 26。

⑤ 爱泼斯坦：《中国的农村选举：用民主来测验》，in 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ed.), *China's Economic Future* (WashingtonDC, 1996)。

⑥ 史天健：《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村庄选举》，p. 437。

其他学者强调了国家政治领袖的领导作用。郑永年^①、凯文·欧博文、李连江^②等学者认为，共产党领导人如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积极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事实上就是这些领导人倡导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并使其成为惯例，同时要求农村实行直接选举从而为村半竞争性选举的发展建立了政治基础。^③

史天健则认为，民政部门的中级官员们是农村半竞争性选举发展的推动力量。他认为正是这些官员监督着农村选举。最初，他们只是对选举的实行感兴趣，之后又注意到了这些选举过程中的问题。只有在有足够的把握之后，他们才开始向下发布新的法规来取消那种受到地方和乡镇干部们操控的选举形式。^④

除了强调这部分人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从农民当中的政治反对力量方面去理解农村选举的发展。例如，凯文·欧博文和李连江（1996年）就调查了中国农村政治反对力量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且将他们分为三类：“刁民”、“顺民”和“钉子户”。“刁民”对党和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互惠的默契模式。换句话说，村民们只有在农村干部产生于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才和他们的合作；否则，他们就和乡村政府对着干。^⑤

① 郑永年：《中国会变得更民主吗？》，《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1998年，pp. 437-455。

② 凯文·欧博文，李连江：“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 — 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00年6月，No. 162，pp. 465-489。

③ 一个村委会通常包括5-10名村民们选举出来的领导。村委会本该协助乡镇政府实施政府指令。但村委会并不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村委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分配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

④ 史天健：《中国的村委会选举：民主制度化的策略》，《世界政治》，1999年4月，Vol. 51，No. 3，pp. 385-412。

⑤ 李连江，凯文·欧博文：《当代中国的农民依法抗争》，《当代中国》，1996年1月，Vol. 22，No. 1，pp. 28-66。也可见凯文·欧博文，李连江“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中国季刊》，1995年7月，No. 143，pp. 756-783。

其次，学术界关心竞争性选举在村一级实行产生了怎样的效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关系的影响；（2）对农民政治倾向的影响；（3）对村民和他们的上级乡镇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

关于半竞争性选举对村党支部（由上级任命）和村委会（村民选举产生）之间关系的影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戴慕珍和罗思高发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不管村委会存不存在半竞争性选举，村党支部书记都拥有全部决策权。而在贫穷的农村，乡镇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不尽满意，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就成了决策权的掌握者。这个结论部分地得到了欧博文的支持，他发现在大部分农村，党支部往往比村委会更有权力；党支部往往在政治活动中拥有最终的决策权。^① 何包钢和郎友兴在浙江省的案例调查基础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村党支部的权力并没有被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吞噬，尽管也有一些案例表明村主任威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权威。^②

也有一些学者发现村委会选举对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构成了挑战。郭正林和白思鼎阐述了选举如何挑战村党支部的传统权威。特别是当村党支部书记以及/或者党员没有作为候选人参加村委会选举时，村民们会认为党组织放弃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或者至少没有自信能够赢得选举。因此党组织的权威从根本上衰退了。^③ 李连江（1999）和白钢等人发现村党组织的权威遭到了村委会的挑战。这个挑战如此严峻，以至于一些地方党委为了重建村党组织的权威而引进了普通群众参加村党支部

① 凯文·欧博文：“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为“中国农村选举影响研究会议”（2006年3月16-18日）准备的文件，未发表。

② 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 280。

③ 郭正林，白思鼎：《选举对村庄权力机构的影响：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

书记选举时的投票的作法。^① 墨宁 (1996) 间接肯定了这种威胁的存在。她发现在选举实行的地方, 村民和村领导之间有更多的相互信任; 村民和村领导之间的政治距离缩短了; 而且村民们对选举也更关心。^② 换句话说, 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的作为与由上级机关任命的村党支部有所不同。

关于半竞争性选举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戴慕珍和罗思高认为农村选举并没有使农民更关心政治权利。农民并没有因为村选举而更关心政治或者维护自己的权利。村民对村选举的最大期望是能够选出更有能力的人来做村委会的领导, 而这些领导能够带领他们致富。

然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村半竞争性选举确实对农村政治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江西省一个县 20 个农村的调查中, 李连江 (2003) 发现公平的农村选举在村民中激励了一种对权利和责任的追求。农民不投那些不尽责干部的票, 并且要求他们选出来的村干部抵制那些不能保护村民利益的地方政策。^③

关于农村选举带来的其他政治方面的变化, 何清涟发现农村的恶势力有活跃的趋势, 因为选举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④ 肖唐镖和贺雪峰发现小派别也受到了农村选举的激励。在那些举行半竞争性选举的农村, 小集团有能力分裂集体。^⑤

关于半竞争性选举对农村和乡镇政府或更上级领导之间关系的影响, 学者们认为选举给了村委会一个新的政治合法地位。这个合法地位

① 李连江: "The Two-ballot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subject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o a popular vote", *The China Journal*, 1999 年, No. 42。白钢等《选举与治理: 中国村民自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② 墨宁: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美国政治学评论》, 1996 年, Vol. 90, No. 4, pp. 736-748。研究结果建立在对安徽、河北省和天津市 56 个村庄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③ 李连江: 《中国农村选举的授权效果》, 《亚洲研究》, 2003 年 7-8 月, Vol. 43, No. 4, pp. 648-662。

④ 何清涟: 《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的兴起》, 《21 世纪》, 1997 年 7 月, Vol. 41, pp. 129-134。

⑤ 肖唐镖, 贺雪峰: 《村委会选举观察》,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可以用来执行上面的政策指示，也可以用来阻挡乡镇和县级政府的命令。

由美国卡特中心和中国民政部联合举办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农村选举是疏导地方民愤的有利途径，因此，农村选举有助于确保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地方民主一直是疏导农村不满情绪的重要的安全阀，否则这些不满情绪将会越来越激进，从而威胁到党的执政。^①

然而，李连江和凯文·欧博文（1995年）认为，选出来的村领导，在拥有了民主合法权之后，形成了明显的“冲突文化”（conflict culture）。只要他们觉得来自上级的压力难以忍受，就会扮演选举产生的村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履行自己执行上级政府部门（党）的方针和法规的职责。因此，乡镇一级的干部常常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起联手来解决这种问题。然而，他们的干预常常会激起村委会和村民一方更大的抵触情绪。对于这样的矛盾，只有持续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回应。

第二节 可供选择的几种解释理论

尽管作者们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上述大部分对中国村一级半竞争性选举发展的研究，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建立在民主化理论基础上的。

认为半竞争性选举首先广泛出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这个推断来自现代化理论对于民主化的论述。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促成了民主的发展。这包括发达的工业化、相当水平的财富、广泛发展的教育以及城市化的扩张。李普塞特是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他认为，“也许把政治体制和社会其他方面最普遍的连接体现在民主和经济发展状况的联系。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民族越发达，它发展民主的机会越大。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代，人们都认为只有在一个富裕的社会，即相对而言

^① 罗伯特·巴斯托，谭青山：《中国农村选举的意义》，《中国季刊》，2000年7月，No. 162，pp. 490-512。

极少有人生活在真正贫困状态的社会中，才能实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理智的参与到政治中来，并且拥有避免被不负责任的政治家煽动的自制力。”^① 经济发展的指标包括：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在这些指标中，财富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共享每辆机动车辆和每位医生的人数以及每一千人拥有的收音机、电话和报纸的数量。在48个案例的基础上，李普塞特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在李普塞特引领了相关研究之后，其他学者进一步肯定了他的理论。在这些学者中，约翰·海丽威尔（1992年）在1960到1985年间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125个国家的综合调查数据，证明收入对民主的影响是显著的、绝对的。^② 查尔斯·鲍埃克斯和苏珊·斯托克斯（2003）指出经济发展对19世纪中叶到二战期间民主过渡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并且要比它对民主稳定性的影响更强烈。他们同时也指出，在最近几十年里，一些经济已经发展而尚保持威权的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美元后，也有望在三年的时间里实现民主化。^③

然而，这些认为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条件的观点也受到了质疑。亚当·普沃斯基、丹克瓦特·罗斯托和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对民主稳定性而非对民主化而言的。换句话说，民主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会更稳定，但是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社会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相反，在一个非民主化国家，经济发展可以帮助政权的稳定和其自身的稳定。亚当·普沃斯基认为，“在一些专制出现在收入低水平时期的国家，这些国家其后的发展对民主化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那些专制产生于收入高水平时期的国家中，其后的发展对其自身

① 李普塞特：《民主必要的社会条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合法性》，《美国政治学评论》，1959年3月，Vol. 53, No. 1, p. 75。

② 约翰·海丽威尔：《民主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主义联系》，Cambridge, MA：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1992年，No. 4066。

③ 查尔斯·鲍埃克斯，苏珊·斯托克斯：《内生民主》，芝加哥大学，2003年7月17日。

更加稳定有着明确而强烈的影响。”^①

塞缪尔·亨廷顿（1991）将这两种观点（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积极影响的观点以及经济发展对尚未实行民主化的国家有积极影响的观点）统一了起来。他将世界上民主化进程的最近发展分为五类：（1）专制政府无法解决由于军事和经济困境而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合法性问题；（2）很多国家经济的新兴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也增强了人民自我表达的愿望和能力；（3）宗教体制的变化使它们更倾向于反对政府的专制而非维持现状；（4）外部力量例如非政府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对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推动；（5）其他国家民主化的示范作用和“雪球效应”通过国际传媒和交往不断增强。^②

亨廷顿认为的第二种情况符合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但是他的第一种情况却符合亚当·普沃斯基的观点。在这方面，他认为，由于非民主政体无法像民主政体那样从政治程序中获得合法性，因此他们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增加公民的经济收益。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非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时，其政体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从而不得不转向民主化。

现代化理论的另一个观点强调现代化在改变文化作用方面的影响。在政治文化转变为支持民主的文化以后，一个现代化（或后现代）社会将会成长为民主社会。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韦恩·贝克对65个国家和75%世界人口作了“世界价值普查”，在研究了抽样调查得到的三段数据后发现，尽管一些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十分稳固，现代化促使大众文化逐渐脱离绝对的规范和价值，转而向越来越理性的、包容的、信任的和与人分享的价值。^③ 英格尔哈特和贝克认为，先进的工业

① 亚当·普沃斯基：《经济发展和向民主的过渡》，工作文件，2004年3月，p. 14，参见 <http://www.nyu.edu/gsas/dept/politics/faculty/przeworski/papers/transwp.pdf>。

②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③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韦恩·贝克：《现代化、文化变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坚持》，《美国社会学评论》，2000年，Vol. 65，pp. 19-51。

社会享有空前的安全感，这促使下一代向后物质主义和后现代价值观念转变。他们认为，富裕国家的公众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环境保护和自我表现。^① 这种和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相联系的新文化增强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从而使社会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另外一种方法，目前似乎还没有用于解释中国的村选举，就是结构方法。在其先锋著作《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巴林顿·摩尔发现不同的阶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20 世纪一些主要的国家最终实行了议会民主制，而另一些则变为了法西斯独裁主义。他认为现代化早期由农业商品化决定的阶级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一些国家中，农业商品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他们可以和拥有土地的上层传统权威以及小农阶层抗衡，从而减弱国家专制主义的倾向。^② 简言之，也即“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③

在其后对民主化理论结构方法的研究中，摩尔因为太过强调资产阶级和忽略工人阶级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而受到了批判。^④ 迪特里希·鲁斯切梅耶等人对 38 个不同国家和时间的案例进行了广泛探讨和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为民主化创造了体制条件，但却是工人阶级使它最终实现。他们将民主化视为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性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普通劳工阶层成功的、自觉的改革策略，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独裁。^⑤

①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韦恩·贝克：《现代化、文化变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坚持》，《美国社会学评论》，2000 年，Vol. 65，p. 21。

② 巴林顿·摩尔：《专政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中的地主和农民》，beacon press，1966。

③ 同上，p. 418。

④ 戈兰·瑟尔伯恩：“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新左派评论》，1977 年 5-6 月，No. 103，pp. 3-141。

⑤ 迪特里希·鲁斯切梅耶，E·斯蒂芬斯，J·斯蒂芬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年。